

# 生态符号学学科建构探索

王铭玉<sup>1</sup> 佟颖<sup>2</sup>

(1.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2.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俄语系, 天津 300202)

**提 要** 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生态学的强劲发展引来了学科的泛化和生态学化,学界尝试将人文、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从生态的视角审视各种问题,生态符号学应运而生。目前,虽然相关研究备受关注,但关于生态符号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仍不清楚,研究对象也不够明晰,与相近学科的区别尚不明显,学科地位难以确定。本文通过对既往成果的综览、梳理、评述,对相关基础性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力图回答有关学科建构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生态符号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定位、学科旨趣、学科基础、学科原则、学科应用等,并对生态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关系、生态符号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强调生态符号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 生态符号学 学科建构 基础研究 应用分析

## 一、引 言

“生态学”这一术语是由恩斯特·海克尔(E. Haeckel)于 1866 年首次提出和定义的。换句话说,生态学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生态学的发展才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即生态泛化(黄国文 2017:15)。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生态学之风涌入了符号学的大院。起初,塔图学派将符号学运用于生物学领域,推动了生态领域的符号学研究进程。1993 年,艾尔弗雷德(L. Alfred)提出“符号生态学”,并建议以皮尔斯(C. S. Peirce)符号学为基础进行研究;1996 年,诺特(W. Nöth)提出“生态符号学”,并对其加以界定,同年,伯纳德(Bernard)、鲍姆(Böhme)、豪泽(Hauser)、霍夫梅耶(J. Hoffmeyer)、霍恩伯格(A. Hornborg)发文探讨该领域中的相关问题;1997 年,莱姆克(J. Lemke)以社会符号学为背景阐述此概念,坦布罗克(G. Tembrock)提及“生态符号学”和“环境符号过程”,霍夫梅耶以“eco-semiotic”命名这一学科;1998 年,诺特和库尔(K. Kull)分别以《生态符号学》和《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多重自然》为题发文。2001 年,两人将这一学科定名为“生态符号学”(T. Maran & K. Kull 2014:42-43)。

国内对该学科的关注较晚,以论文为主。如胡壮麟(2014)从历时角度介绍生态符号学各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代玮炜等(2014)从“符号域”与“环境界”融合的角度论及了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的渊源和发展情况;朱琳等(2014)探讨了生态符号学在民俗仪式中的应用;岳国法等(2016)探讨了生态符号学在自然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应用价值;姚婷婷(2017)从继承、推进、融合和前瞻等阶段探讨了新塔图学派学者对传统理论的发展,把生态符号学视为融合阶段的产物;彭佳(2017)探讨了生态符号学的基本原则;王新朋等(2017)则从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角度分析了生态符号学的两个基本概念——“符号域”和“环境界”。

## 二、生态符号学的学科界定

诺特认为,生态符号学关注所有生命体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符号互动,自然符号是其研究对象。这一定义囊括了所有生命体与内/外环境互动的符号学方面,与生物符号学基本同义(彭佳 2017:58)。库尔(1998:349)质疑诺特的界定,将“符号生态学”界定为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符号关系研究,主要探讨符号调节下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定义表明,人作为意义主体,他的符号活动影响着整个生命意义世界,对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活动和生态圈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发挥着重大作用。

生态符号学的融合性和跨学科性使相关学科的学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生态学和符号学的结合,此举虽然丰富了二者的交叉性和接缘性,但也造成了生态符号学在命名形式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门新兴学科与很多相近学科和分支学科混淆不清。迄今为止,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认识,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任务不具体,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极大地限制了该学科的发展速度。

当然,从术语结构角度来看,“生态符号学”这一学科名称可拆分为“生态+符号+学”(ecology+sign+studies)、“生态+符号学”(ecology+semiotics)和“生态符号+学”(eco-sign+studies)等三种模式,它们从不同视角勾勒着生态符号学的图景,又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着该学科,凸显其研究的侧重点。“生态+符号+学”的界定方式指明了生态符号学的跨学科性,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学和符号学相结合的产物,二者构成生态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两学科融合的关键在于“符号域”和“环境界”的同质性;“生态+符号学”指的是生态学基本理论在符号领域的应用研究,发挥生态学的方法论价值,注重理论的嫁接式拓展,也就是说,生态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路径等参与符号领域的知识生产,生态学术语被符号学领域借用,并融合产生新的术语概念体系或理论框架;“生态符号+学”是狭义的定义,这种界定方式指明生态符号学对生态符号的研究,即从多角度探究生态符号的形式、内涵及功用,从而清晰地认识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并利用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来引导生态符号的生产和制作,加强人、文化和自然的和谐互动。

综上,我们认为,生态符号学是以生态学和符号学为基础,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用于符号研究,并分析生态符号的产生机制和运作规律的学科。

### 三、生态符号学的学科定位

生态符号学作为生态学与符号学融合的交叉学科,与生物学、生态学和符号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符号生态学、生命符号学和动物符号学等交叉学科存在着复杂纠缠的关系。

首先,从学科归属来看:符号生态学是生态学的延伸,属生态学分支,探讨生态学领域的生境、种群、互惠、共生、生态位等概念和模型与人类的符号活动和符号之间的关系(J. C. Bang & W. Trampe 2014:88)。生命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则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它们运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符号学领域的问题。如果将生命的起源和变化看作由生命代码操控的过程,像似符出现在所有的符号过程中,生命体受本物种基因控制,在很多方面保有共同特征;指示符在一般动物的符号过程中占主导,反映了动物的进化轨迹;而象征符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升,主要反映于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符号过程之中。因此,所有生命体都有符号活动。据此,生命符号学几乎与符号学同域,它既包括人类的符号世界,也包括动植物的符号世界,由此可以认为,动物符号学只是生命符号学的分支学科。

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生命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囊括所有生命体,考察全部符号过程,强调符号过程与生命过程的一致;动物符号学研究人类和非人类的前语言符号过程和行为,包括生理行为,扩大了符号学中非语言符号研究的范围;生态符号学把生态系统看作交流系统,研究与生态现象(物种、种群模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关或相似的符号过程,将一定空间内的符号关系作为研究对象(T. Maran & K. Kull 2014:41)。

再次,从学科性质来看:生态符号学将符号过程与生命系统绑定在一起,把生命的起源视为指称、代码、意义和符号过程的起源(同上),对生物学和非象征性符号过程的进一步认识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生态符号学打破文化与自然的对立,借助符号域,分析整个生态系统的交际意义。

### 四、生态符号学的学科旨趣

生态符号学致力于探索生命体的符号活动,生命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类作为特殊的生命体,在构建自我世界的过程中,不能过分张扬主体性,应积极反思,为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活动负责(彭佳 2017:54);生态符号学致力于弥合自然与文化的裂隙,实现二者的共荣。因此,生态符号学作为研究生命体的符号活动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的学科,其学科旨趣就是实现生命体之间、生命体与环境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对话,使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符号过程具有连续性。比如,针对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人类应该适当抑制自己主体性的发挥,留出足够的生命空间,根据物种的符号关联特性,维护和改善环境,保其生存,促其繁衍,实现人类与其它生命体之间的和谐共存。

### 五、生态符号学的学科基础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符号学的研究扩展至生命活动,生态学和符号学一拍即合,生态符号学得到了蓬勃发展。符号学、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角度对其阐述、分析,在

推动该学科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参见胡壮麟 2014:24)。

1. 莫斯科-塔图学派的符号学理论。莫斯科-塔图学派最早将符号学方法引入生态研究,考察所有生命符号活动,用结构主义方法描写物质环境,用文本意义指称自然环境中的情景,由该学派学者提出的“符号域”和“环境界”两概念的融合直接促成生态符号学的产生。洛特曼(J. Lotman)受维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生物域”启发,提出“符号域”概念,用来阐释思维、文本和文化的世界。乌克斯库尔(J. Von Uexkull)在生物学领域提出“环境界”概念,用来描述人和动物的世界。符号域中的元文本与环境界中的元解释意义相当,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塑(model)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通道,即生命体通过映现和构建生存环境实现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文本与语境之间也存在这种描摹和塑造的关系(王新朋等 2017:147)。

2. 西比奥克的动物符号学。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打破了莫斯科-塔图学派的模塑系统观,将生命体的感知系统作为第一模塑系统,因此,动物的所有活动,包括生理活动,都是符号行为。人作为生物有机体和文化生物,能运用高层次的模塑系统来描述并反思符号活动,传递和评价符号行为中的信息。

3. 诺特的宇宙整体观。受皮尔斯(C. Pierce)和莫里斯(C. Morris)的符号学思想影响,诺特认为,符号由媒介、对象和解释等三项构成,生命体感知环境,通过思维产生意义,并生成符号,这才是完整的符号行为。总之,诺特侧重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主张宇宙整体观。

4. 乌克斯库尔的客观环境(Umwelt)论。乌克斯库尔是最早关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的学者,认为有机体的内部世界含有对客观环境的认知模型,二者之间构成“解释循环”,有机体接受环境的同时构建环境。因此,乌克斯库尔的“客观环境”带有明显的主体性,这一命名只是针对 Haeckel 的“外部世界”。

5. 库尔的人类生态学。库尔强调主体的人类生态学的重要性,认为生态符号学应处理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及其符号生成过程。库尔反对乌克斯库尔“环境界”中的自然独特观,将自然划分为零度自然(无人踏足的纯粹荒野)、一度自然(语言和符号指认的自然)、二度自然(是我们对自然的意象)和三度自然(艺术品或科学中虚拟化的自然)。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在彼此边界划分或科学界定上也存在模糊问题。我们认为,一方面,零度自然应该是未被染指的荒野,一度自然是人类对自然的抽象意象,二度自然是根据意象重建的自然,三度自然是对自然意象的符号呈现。另一方面,人类的符号过程就是环境符号化的过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人类相关的生态系统只能称为再度自然,零度自然几乎不存在,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貌均带有设计感,呈现出均匀性、规律性和对称性等等。受人类特有文化的影响,某些自然生物被冠以“美名”和“恶名”,其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干预,失去了平衡,如在汉文化中猫头鹰是凶兆,在俄罗斯文化中猫头鹰却象征着吉祥、幸福,因人类的喜恶,同一种动物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况在两个国度的差别很大。人类至今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再度自然的入侵程度,也没有意识到之后的再度自然中生态描写的歪曲性,因此,很难真正维持人类与其所在生态系统的平衡。

6. 迪利(J. Deely)的生物中心主义。迪利认为人类文化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生成要结合和依赖生物符号,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成分之一。生态符号学正是基于此观点,调整人

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消除对立,弥合裂痕。

7. 霍夫梅耶的文化-自然三维观。霍夫梅耶将自然分为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这样,自然与文化形成了三角关系,突破了库尔所认为的生态符号学只研究文化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且这种研究在共时和历时双向轴列上进行,并不仅限于库尔所说的共时轴向。

## 六、生态符号学的学科原则

生态符号学的构建是个系统工作,首先需要构拟理论框架,制定理论原则。世界符号学三大流派之一的莫斯科-塔图学派的系列思想对生态符号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洛特曼“模式化系统思想观”、马伦(T. Maran)和库尔“理论框架观”(2014:43-47)等为生态符号学理论原则的生成提供了基础性的脉络(王铭玉、王双燕 2019),我们尝试对其进行归纳和阐释,并提出以下九条原则。

1. 关系原则。生态群落结构(Ecological community structure)以符号关系为基础。大多数物种内和物种间的联系依赖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经历、交流和定位等,生命和符号活动具有同延性,符号活动本身是一种关系现象,它把生物体和它们的对象,以及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物体或不同层次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我们熟知的食物链系统就反映了生命体之间的符号关系。

2. 秩序原则。符号的变化可以引起事物现有秩序的变化。生命体对环境的映现改变着环境,环境中符号活动的变化会影响生态和进化时标(timescale),不同动物的生态位构建反映生态水平,生物拟态(biological mimicry)是进化效应的实例。如加拿大“海狸水坝-建造”就体现了动物对周围环境的映现。据北美海狸专家们推测,该水坝由多个海狸家族联手建造,为这一地区的海狸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改变了原有生命体之间的符号关系,进而改变了周围的生态。

3. 调节原则。符号活动调节着生态系统。生命体的符号活动可以通过建构意义、发挥调节作用,保持生态系统的综合和稳定,也能通过注入创造性的力量促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如苍鹭经历代繁衍掌握了一种诱捕鱼类的方法,它们在饥饿的时候捉些小虫放到水里,待鱼群聚集后,趁其不备迅速捕食游到身边的鱼。这种创造性的猎食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符号活动的调节作用,改变生态系统的同时,也自为地保持着系统的综合和稳定。

4. 退化原则。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操作演变成物理操作,导致自然出现了符号化和文化化的情况,即被人类染指的第二自然出现,人类的象征符号活动具有去语境化的能力,与环境退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如人类出于经济利益、文化审美等多种原因,小范围内给花园和公园中的植物造型,使其已经失去了原生状态,成为了符号化的景观,而大范围内砍伐森林建造房屋等则彻底剥夺了自然环境中某些物种的生存权利,人类符号行为的扩张性会导致环境的退化。

5. 关联原则。从能量和生物地理化学角度看,人类文化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符号学角度看,文化模型是生态系统建模的元型;人类对环境的符号学介入本质上是混合的,除象征符号外,像似符号和索引符号都将人类的符号活动与周围环境紧密地连在一起。缺乏生态维度的文化概念是不完整的,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不合逻辑的。

6. 环境原则。环境辅助记忆,记录关于某一地域所有权的信息和定位的线索,不同物种通过感知-行动的循环参与到生态系统中;环境是生态系统作用的时空表现,组织和协调生态

关系的界面,交流和符号关系通过环境结构发挥作用。例如,欧洲高速公路周围的无声区,因听觉环境变化,生物体之间无法正常交流,致使鸣禽数量剧减,这是环境变化导致生命体之间产生符号冲突和交流冲突的例证。

7. 有限原则。人类的叙事性描述不适用于生态符号活动。非人类物种的符号可归纳为只是简单符号关系的累积效应或使用环境辅助手段的共同效应,不涉及语言,不具有叙事性。叙事性描述作为对生态事件的隐喻式叙述,是人类解释的一部分,在环境符号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但不能充分描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非象征性(像似性的、索引性的、无意识的)符号关系,且这种叙述往往产生象征意义。

8. 模塑原则。模塑即“模式化”过程,是生命体理解世界的路径,展示生命体对世界的映现,也是世界形成的渊源,反映世界对生命体的意义(王新朋等 2017:146)。受洛特曼影响,塔图学派符号学家认为自然语言模塑现实世界,是第一模式化系统,而文化,基于自然语言,是第二模式化系统(代玮炜等 2014:84)。西比奥克受此种思想启发,认为所有生命体的感知系统是首度模塑系统,语言是第二,其它是第三,生命体根据各自的功能圈感知、辨认世界,并生成意义,从而模塑出本物种特有的环境界(彭佳等 2012:119)。

9. 文本原则。从功能视角看,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文化性,是可以被文本化的,自然-文本就是文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中介单元。马伦(2007:284)认为,生态符号学描述自然环境本身,也研究书写文本。自然-文本概念使自然文本化,进而从符号域角度分析,使生态符号学具有了实际的操作性。人类的书写文本中对环境的描述不必细致到传达所有含义,读者凭借感知过的环境能想象出来文本所指向的对象。阅读文本的过程是双重的,感受文本描写与个人感知的环境对立的同时,读者又能凭借记忆和认知能力将人类符号模型、动物符号模型和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使人类、图景和自然形成一个连续统,展现动态的进化过程。

## 七、生态符号学的学科应用

生态符号学,如同符号学一样,在很多领域发挥着方法论作用,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涉及文学、民俗学、图形语言分析、地图学等具体领域。

### 7.1 文学

岳国法等(2016)以贝斯顿(H. Beston)的《遥远的房屋》(*The Outermost House* 1988)和威廉斯(T. Williams)的《心灵的慰藉》(*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1991)为例,运用生态符号学分析自然文学的文本世界,从象似性方面展示自然现象有限性中的无限性,从文本的符号现实化方面探讨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突出自然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

### 7.2 民俗学

朱林等(2014)通过分析凉山彝族会理县“密”仪式(此仪式是一项治疗仪式,具有典型过渡仪式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崇拜的思维机制)来阐释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人是一种符号动物和伦理动物,人类一直在反思与世界(包括物质世界、文化世界和

思维世界)之间的关系。

### 7.3 图形语言分析

伊瓦先科(И. И. Иващенко 2015)以 20 世纪后半期到 21 世纪初的环保图标为对象物,将图标的形态学、生态符号学方面的特点及其真实性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瑞典、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环保图标的特点,指出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民族、宗教和哲学伦理对生态符号产生、使用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 7.4 地图学

泰勒(D. R. F. Taylor 2015)在《现代地图学丛书》(*Modern Cartography Series*)的“作为地图像似符号的景观”(Landscape as a Cartographic Icon)章节中指出,景观往往应用透视法,运用色彩象征不同的地理环境(如蓝绿色表现低洼的湿地,赭褐色表现高原和干枯的地域),运用体积来呈现“远”和“近”的概念。地图则应用垂直法,通过比例和位置来呈现某一地域的地理环境。二者的绘制都包含人的主体性,是带有特定目的的符号活动。绘图者引导看图者关注本人或者行政者希望其关注的点,达成改造或改建某地区的目的。因此,地图作为特殊的生态符号,已经成为发展新型通讯形式的重要战略工具。

## 八、生态符号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语言属于典型的符号系统,任何一门研究符号学的学科不可能绕开语言符号而独自前行。首先来看生态语言学。近些年来,生态语言学发展迅猛,它借鉴生态学原理来研究语言符号,研究人这个有机生命体与其周围语境的相互关系。目前,生态语言学为学界所熟知并且广泛认同的是 Haugen 模式和 Halliday 模式,主要关注生态语言学的三个热点问题: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语言人权问题。显然,生态语言学不仅观照,而且以研究语言学为己任。生态符号学作为它的上位概念,除了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语言学的系统观照之外,它还从生态符号学的角度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方法和思路,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 8.1 符号域(semiosphere)以语言为界

当今的塔尔图符号学是建立在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这两大符号学传统之上的,二者的标志性学术理论可分别归于“符号域”和“环境界”两个术语。根据洛特曼的界定,符号域指的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和机制,它既是文化存在的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胡易容、赵毅衡 2012:69)。各文化的自然语是符号域的边界,语言作为基本符号构成各类文本,文本再组成符号域,形成文化自身的屏障,任何外来文本都要经过这道屏障的检测、过滤,发生一定的变化才能进入(代玮炜等 2014:84)。因此,在语言学的研究之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符号域”这一概念,尤其在文本意义的多次转换和激活中,要考虑到“语言边界”的特殊作用。

### 8.2 “环境界”是个体语言生存的语境

乌克斯库尔是 20 世纪推动生物学进行符号学转向的开拓者,他提出了“环境界”的概

念,从而促使符号学研究从以人类为中心逐渐拓展到生物学领域。环境界包括生命体的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为世界(Wirkwelt),两者相互融合,形成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换言之,生命体通过感知和行为,探测周围的世界,展开对所生存环境的解释(王新朋等2017:145)。显然,环境界源自阐释,也是一种交流的场域,它弥漫着无尽的符号活动。对语言学而言,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语言符号,也指非语言符号系统,并和符号域概念联系起来:符号域是所有彼此关联的环境界的集合,任何两个环境界,倘若正处于交流之中,都是同一符号域的一部分,环境界是一种个体的符号空间(Kull 2005:179)。二者相比,符号域的空间更大,它是符号活动、意义生成和质性多样化的空间,也是展现整体部分关系的空间,多样性是它的核心概念;而环境界则凸显了生命体对环境解释和选择的主体性,有助于应对全球面临的文化同质化趋势。所以,在语言学研究中,我们既要分析质性多样的符号域,同时也要关注彼此间的界限以及生存的语境,尤其要把握“语言差异”问题,因为交流往往促使彼此的环境界更为相似,引发世界同质化和多样性的丧失,这一点在生物群体和人类文化中莫不如此。

### 8.3 多重自然(different natures)加强了语言的作用

对于自然的分类有多种说法,如前所述,生态符号学家卡拉威·库尔提出了多重自然的概念。依他看来,在符号学的视域下,自然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多重的融合,人类环境界之中的自然可以切分为四重自然。零度自然是自行变化的自然,是本体符号过程作用下的自然;一度自然是经由语言符号过滤的自然,是人类特有的语言符号作用下的自然,是我们对零度自然的认知,也是我们对自然的印象,无论是神话层面、社会认知层面抑或科学层面,是人类符号过程中范畴化的自然;二度自然是人类干预了的自然,被操控的自然;三度自然则是诠释之诠释,翻译之翻译,自然印象之印象,是纯粹理论和艺术层面的自然。倘若采用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理论来诠释多重自然的概念,一度自然是我们的感知世界,二度自然是行为世界,三度自然是内部世界。一度自然和二度自然的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界,零度自然则是纯粹意义上康德的物自身(Ding an sich)的自然(Kull 1998:358)。多重自然观使我们认识到,零度自然是从自然到自然,功能是用来区别发生的,主要是生物学家的的工作,语言学在此的作用空间不大;一度自然是来自自然的意象,是人们所观察到的和描写的,语言从此阶段开始发挥作用;二度自然是从意象到自然,一般存在于实验室中,此阶段自然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运用某种模型,尤其是语言符号模型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三度自然是从意象到意象,主要的功用是理论构拟,存在于论文中和模式中,语言在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主体作用和符号过程,经由语言符号的过滤,往往出现了高度自然替代低度自然的情况,我们对语言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世界的走向。

### 8.4 三个世界配置了语言的功用

生态符号学呈现的是人和自然的符号关系,专注于人类和其所处生态系统之间的符号过程,包括不同地域的符号特征、自然之于人类的角色,如人类与自然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展开沟通与合作?自然对人类有何意义?人类又如何作用并服务于自然?采用莫里斯(Ch. Morris)的符号三个世界的分类法,从语构或符构角度来看,生态符号学研究自然呈现的结构和范畴归类,语



言承担着描述功能,即对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及其排列进行描写的功能;从语义或符义视角来看,生态符号学描述自然相对于人类的意义或自然之中蕴含的内容,语言承担着表义功能,即对客观现象的价值意义及其生成进行分析和表述;从语用和符用层面来看,生态符号学致力于探寻自然与人类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自然符号化过程中的参与,语言承担着交际功能,即对“天然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的介入性维系和运用。三个世界决定了语言的功用不同,语言学的研究应该关注生态符号学的层次配置。

### 8.5 生态均衡性反证了汉字的常态演化

生态符号学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以生态学为基础和出发点。一个理想的生态系统能够长时间稳定地维持它的组织机构和自治,在生存上能够维持对各种胁迫的恢复力,在环境上能够维持自身的复杂性和对人类需求的供给性。符号学之所以要和生态学交叉,不仅仅在于它对生态的兴趣,关键还在于它对生态均衡和谐方法的追求,对可持续性发展的向往。

语言是人类文明最基础的符号体系。长时间以来,“西方语音中心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将汉字视为落后、原始的符号形态。但生态符号学研究表明,就纯粹的符号形式特征而言,汉字符号较字母文字更接近于西方符号学家对理想符号的构想。符号学家皮尔斯曾从广义的符号角度出发提出过一种“完美符号”观念。他认为完美的符号应是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三种形式“尽可能均匀的混合符号”(Peirce 1935:362)。世界现有的主要文字系统大都经历了原初理据的衰落和使用理据的兴起,区别于拉丁字母的音形断裂,汉字正是沿着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从类图像的像似符号演变成指示性的索引符号,再演变成规约性的象征符号,最终形成由“形、意、音”构成的稳定的三元结构结合体,整个演变过程是相对完整的连续统。这种三元结构符号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朝代的更迭,时空的跨越,都无法改变以汉字符号为主导的华夏文明的强大向心力(胡易容 2018:160)。由此来看,“理据性的自然衰落与符号系统均衡发展”体现了生态符号学的基本内涵,而汉字的生态属性明显、符号意味浓厚、文化传承力强大、可持续性能理想,生态符号学对汉字的演化富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汉字完全可以构成生态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 九、结 语

生态符号学虽处于初建阶段,但其实用价值已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发展空间也是可预见的。在建立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障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和谐的生态符号关系,以实现真正的和谐符号世界是我们探索的目标。其间也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值得符号学研究者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代玮炜等 2014 从符号域到生命符号学:塔尔图对符号界域的推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胡易容、赵毅衡 2012 《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 胡易容 2018 符号达尔文主义及其反思:基于汉字演化生态的符号学解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胡壮麟 2014 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外语研究》第4期。
- 黄国文 2017 生态语言学研究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第4期。
- 彭佳等 2012 与生命科学的交光互影:论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俄罗斯文艺》第3期。
- 彭佳 2017 人的主体维度:符号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鄱阳湖学刊》第4期。
- 王铭玉、王双燕 2019 《符号学思想论》之说论,《当代修辞学》第1期。
- 王新朋等 2017 环境界与符号域探析,《俄罗斯文艺》第4期。
- 姚婷婷 2017 新世纪塔尔图学派的研究动态,《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第6期。
- 岳国法等 2016 可然性模仿:自然文学文本世界的生态符号学阐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朱林等 2014 凉山彝族治疗仪式的生态符号学分析——以会理县“密”仪式为例,《鄱阳湖学刊》第6期。
- Bang, J. C. & Trampe, W. 2014 Aspects of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language. *Language sciences*, 41:83-92.
- Kull, K. 1998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Sign Systems Studies*, 26:344-371.
- Kull, K. 2005 Semiosphere and a dual ecology: paradoxes of communica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33:175-189.
- Maran, T. 2007 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 *Sign Systems Studies*, 1/2:269-294.
- Maran, T. & Kull, K. 2014 Ecosemiotics: Main principl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s.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41-50.
- Peirce, C. S. 1935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M, Exact Logic*.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D. R. F. 2015 Modern cartography se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6:85-115.
- Иващенко, И. И. 2015 Влияние древне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на аутентич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экомаркировки]. *Теорія мистецтва*, 4:44-50.

## Exploration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cosemiotics

Wang Mingyu & Tong Ying

**Abstract:**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rong development of ecology has extensively exerted an ecological influence upon various disciplines. So ecosemiotics came into being when scholars via semiotics were dedicated to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r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en examining various question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o far, related research has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though, there is a want of clear definitions of basic concept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cosemiotics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which resulted in an ambiguous disciplinary position of ecosemiotics. By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vio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pap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ed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swer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disciplinary definition of ecosemiotics, its positioning, academic objectives and interest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and construction rul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and how it inspires linguistic research, while shedding light on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ecosemiotics.

**Keywords:** ecosemiotic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undamental research, applied analysis